

## 第一章 舊的酒瓶新的美酒

作爲中國人在近代國際舞台上的安全的興奮劑，我們常常稱之爲「歷史的奇蹟」，這個「奇蹟」的由來，可以從兩方面加以觀察：在技術的一端，它是國民革命和民族主義運動的結果，另一方面，在理論上，它仍然或多或少地依據於一種假定：即帝國主義之間如果在從事行動的中途，突然互相協調起來，把直接的外交轉變爲間接的，則整個被統治或被支配的民族也許還在睡鄉中過其無知的生活，亞州好些地區的民族包括在裏面，中國自然也不會例外。

把這次戰爭當做歷史新舊的分界綫，歐洲人所玩弄的政治把戲對於這種牽強的劃分實在沒有甚麼重大的意義。好多人都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之間「值得惋惜的露脚」，而且已經於一九一八年結束了。作爲和平的幻想來看，我歡迎這種說法，但是我們千萬不要把歐洲「表面的繁榮」和新興的力量混爲一談，在東方的每一個角落裏所長成的「買辦階級」以及比較溫和的「分業主義」始終還是從自然經濟過渡到民族資本的巨大障礙。一九一八年後，戰爭從戰場移到了工廠，也就是說從有形變成了無形，於是亞洲幾萬萬人民的政治與經濟都被驅入一個更爲迷離的深淵裏去，這般人起先只是擦下模糊的眼睛，繼而開始感覺不安，最後簡直跳起來怒吼了。

所以，單從物質的方面去量衡亞洲是不能產生出一種較好的輪廓，單從戰爭的勝負硬把中國分爲二等國或二等國，更不能替這個滯足中流的民族畫出一幅鮮明的圖案。十六世紀初期偉大的航海時代產生了一羣在思想和本能的行爲上都把亞洲解釋爲「不能生長生物的沙漠」的人，對於亞洲人文的解釋沒有加以好好的玩味，自不足怪；十九世紀以後，工業革命的狂風從海洋乃至天空吹遍了東方廣袤綿亘的地區，因此似是而非的理論又代興了，在歐洲人的嘴巴裏，他們說，西方現在是製造「文化之冠」賣給東方人享用，尺寸的大小，任憑選擇，同時就在亞洲各民族中間，尤其是在中國的境內，我們也發生了兩種不調和的思想，一種是對前面的論調抱着百分之百的肯定的態度，其他大部份的人却加以無情的反對。如果要我發表什麼意見，那麼我會毫不遲疑地擁護後面的一種見解，我的理由是：第一，從地理上言之，歐洲不過是亞洲大陸的伸展，烏拉爾山脈以西的地帶無論地形，產物，以及風俗習慣都和東部沒有什麼顯著的差別；第二，元代的武功是由於精神的統一和飽和性的文化所引起的後果，它和十字軍的東征所表現的貴族與地主階級的沒落，中間存在中着一種極顯著的主從的分別；第三，以近代的事例來說，亞洲這個區域，儘管它所演出戰爭的把戲不及歐洲那樣熱鬧，但它却已有力地和漸進地跨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在亞洲所形成的意見以及所做的決定，現在反而大致决定着世界各地事態的演變，亞洲到底是亞洲，它並沒有被「文明之風」吹變了原樣。

在外交的場合裡，人們很少能夠找出一個比較銳敏的政治觀察者，他會將亞洲人的頭腦放在顯微鏡下找出許多潛伏的政治本能，因此他們往往喜歡將愚蠢、散漫，和「上帝所創造的奴才」加在這般人身上，他們已經變成一種透過磚牆看東西的奇怪方法。事實上，資本主義的國家一開始便把自己關在一個「利潤」的囚籠裡：貿易政策，殖民地的征服，和每個地區「勢力範圍」的擴大都是作為他們理解事物出發的據點。

不幸，亞洲的本身却發生了一種怪現象，日本的帝國主義不斷向鄰國實行侵畧，對於大多數的中國人確是一種遺憾和難以置信的行徑，不過，無論在「靜」的東方和「動」的西方，任何的社會制度都有它的思想和經濟的內涵，日本人民也和其他的民族一樣，可以在精神上建立起一種自我的典型，問題只在這種典型沒有通過國內的全部階層和亞洲各民族間的傳統思想因素。我以為，要瞭解日本何以在各階級間造成那樣深刻的脫節，最好引胡適先生一段話，他的意思是：「日本和中國幾乎是同時接受西洋的文化，但前者是從上而下，代表軍閥，皇室的特殊階級，所以它是衝動的，後者是由下而上，它的進步是穩固的，漸進的」，事實上，在大多數日本人的生活中正有着一種潛勢力，這種潛勢力是被用暴力壓服了，而軍閥們在每一次新的危機開始醞釀的時候，照例用一套老舊的方法把它控制起來；他們是一手拿著天皇的聖旨，一手指揮所部在國外造成禍變。不過，「二、二六」事件却是日本的「自由主義者」

開始拾彈的一種明証，不幸，他們和軍閥間還存在着多少的交互作用，所以即使曇花一現，對於他們主張用劍來進行「武士戰爭」還是無補於實際的。

「亞洲的癩疽」本來是一件極其悲苦的毒物，它雖然於一九四五年八月被施行了手術，但留下的創痕却是無可彌補的。大致在此後的二十年中，日本人民要想從勝跡的廢墟中重建昔日的繁榮，那麼他們國內所採取的民主進步運動還不是麥克阿瑟將軍公事包裡的「訓令」所能爲力的，他們從前把中國看做不肯，甘心引狼入室，但他們却忘記了，在十六世紀以後的幾個世代中，日本人幾乎完全生活在東方的思想裡面，基督教和商品的輸入，不過只是代表着西方向東方侵入的一種普通現象罷了。

爲着想和西方的帝國主義和東方的帝國主義分門別類，我想下面的幾種事實是很重要的：

(一) 金融集團所領導的一羣政治人物不但需要向外榨取，以求滿足「主子」的貪慾，他們還需隨時修補彼此間的裂痕。所以他們在前進的步伐上是加速度的；在榨取的形式上是不相均衡的殖民地政策；在技術上，他們是無奇不有的。但在東方，這種現象是不相稱的，日本只是由於少數的特殊階級勾結着財閥變武揚威，他們一面實行不大和諧的生存競爭，同時又要同樣地和西方帝國主義從事決鬥。

(二) 馬克斯主義思想的蘇維埃政權促進了西方帝國主義在亞洲腹地作深入而不平衡的擴張，日本之加入反共協定，不是思想而是策畧的問題，因此日本除了加深亞洲政治的紛亂之外，還把國內封建的

絲帶束緊起來。

(三) 中國的閉關政策由西方的帝國主義首啟其門，他們視環境的許可，有時用炮艦，有時利用無數的傳教士從事親密的提攜，他和日本所採取那種硬性的和步伐不一致的政策是不能相提並論的。譬如說，當日本由中國退出之後，他們幾乎連根都被拔掉，而穿着糖衣的西方帝國主義者，至少站在他們的立場來說，卻沒有這樣下策。

從這幾點看來，真正成爲亞洲問題的問題，當然不會留給英國人或美國人的思想方法尋求解決；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亞洲現在所形成的意見和決定，反而影響其他各地事態的演進，持這種見解的人，當然不能以科學的發展作爲理論的依據。科學進步是一件事，民族的理智又是一件事，戰爭結束後的幾個月來，顯然地，我們已經把一個事實看得更清楚了，那種事實表現殖民地上面，是帝國主義的「羈縻」；表現在中國的問題上面，用一句話說：「張伯倫搭錯了公共汽車」。他們往往喜歡拿着威爾遜「民族自決」的幌子搖擺一下，然後又收藏起來，舊的均衡，新的合作，亞洲人實在不再需要這種徒事空言的老方式。

對於那些「不負責任的騙子」和「理想家中的夢想家」，同樣是要加以剷除的，一個諳知內幕情形的外國官方機關和美國見聞最廣的國際問題評論家，他們對於亞洲的政治形勢大部缺乏正確的瞭解。像